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七期／民國 97 年 9 月／頁 49～94

人類安全概念之形塑：
建構主義的詮釋

蔡育岱*、譚偉恩**

摘　要

在安全研究的基本態度上，應儘可能透過思考與質疑，才有可能裨益安全問題的理解和解決。至於方法上，本文的認知是，人類一切正常行爲的目標就是安全利益的追求。一種新安全概念的形成，事實上就是反應既有安全概念或相關理論之不足。因此，形塑一個新安全概念的用意在於，如何透過概念的倡導與觀念的修正來幫助人類自己更有效、經濟而且衡平的得到所希望追求的安全利益，並且還要符合時代的發展趨勢。

國際關係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是並非完全以物質型態呈現，因爲「有形」或「客觀」的呈現方式可能會具有「無形」或「主觀」之理念訴求。本體論上採納客體與物質主義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容易成爲少數能動者鞏固其既得權力與利益的工具，忽略安全文化的內容是被建構與可以改變的事實，而且在維持現狀秩序的同時對公平正義的問題少有考量。本文嘗試以建構主義詮釋人類安全此種異於傳統安全的新概念，希望在長期所習慣的傳統安全思維裡，帶動些許能動者之間的平等與合理互動。

關鍵詞：建構主義、人類安全、傳統安全、安全利益、共有知識

*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 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收稿日期：96 年 10 月 8 日；通過日期：97 年 8 月 27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1] 某程度上是一種對於全球化與冷戰結束的回應。此概念現已廣泛受到學界與政治領域的關注，並在研究與實踐的過程中為既有的安全研究開闢了新視野，獲得若干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與認同。毋寧，人類安全不單單僅是安全研究議題中的一種抽象概念，同時也是引導或影響國際關係諸多行為者（actors）或能動者（agents）行為之變數，而聯合國可以說是形塑人類安全概念的重要功臣之一。[2]

過去十年間，人類安全已對全球政治產生影響，並成為定義安全變遷的一種流行詞彙（Oberleitner, 2005: 185）。不過在此概念興起與發展的過程中，它的定義、範圍與效用，始終充滿者爭議性；支持者認為它是合時宜的、有助於擴大對傳統安全的關切，是一種典範的轉移，相較傳統安全，更是一種形塑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Oberleitner, 2005: 186）。批評者則指出，人類安全的缺點在於概念過於寬泛，無法反映在實踐上，以致流於一種意識型態（Acharya, 2002）。

本文認為，人類安全目前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概念」，[3] 尚未形成一個專屬於自己的理論。惟人類安全概念並非抽象的意識型態，而是可以透過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或方法予以理解進和應用。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雖然目前對於安全研究的範疇，聚焦於安全社群（security community）或安全文化（security culture），[4] 但作為一個探索

---

1 對於 human security 一詞之中譯，目前常用的兩種譯法為「人類安全」與「人的安全」，本文以聯合國相關報告採用之「人類安全」一詞為準。

2 1994 年，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出版《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揭櫫人類安全的七大項目（內容），分別是：經濟安全、糧食安全、健康安全、環境安全、人身安全、社群安全及政治安全。此報告書強調人類安全是一整合式概念，人們要有能力照顧自己，並有機會達成其最基本的需求（UNDP, 1994: 24-33）。

3 請參見本文第伍節，頁 18 的說明。

4 目前以建構主義探討安全議題較具代表性者為 Karl Deutsch 的安全社群與 Pet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類意識（human consciousness）與國家的認同和利益如何形成的理論（Wendt, 1992: 391-425；Ruggie, 1998: 856-858；莫大華，1999；2007：175-215），建構主義相較於其它的國關理論似乎更適合用來解釋人類安全，同時有裨於人類安全概念之建構及其實質意義之強化。

鑑此，本文試圖以建構主義來詮釋人類安全，將建構主義做爲研究人類安全概念之途徑與立論憑據，並認爲此一概念的形塑過程，是一種建構主義獲得應用之體現。在內容安排上，文章首先追溯人類安全概念的歷史與形成之淵源；其次，檢視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與建構主義的安全思維（包括對人類安全概念的相關立場）；最後，則以建構主義對人類安全進行詮釋，透過「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國家偏好」（preference）、「語言與規範」（language and norm），以及「安全文化」（cultural of security）等層面，說明建構主義對於人類安全此一概念形塑的貢獻，冀望能有助於兩者間的對話和促進對既有安全研究之省思。

貳、人類安全概念的形成和興起

人類安全概念的由來，肇始於早期人類對自我關切之重視，經由一定時間的倡議、研究與能動者在互動關係中的實踐，晚近已隨著全球化的國際情勢發展逐漸形成較爲具體的安全思維。此種「觀念建構」的歷程反映了國際關係中安全概念本身的動態性，並預告一種異於傳統安全的思考興起。

一、形成的淵源

人類安全概念的政治學理探討可追溯至十七世紀的「社會契約論」，[5] 而

Katzenstein 的安全文化。相關說明請見本文第肆節。

[5] Thomas Hobbes 在 1651 年的《利維坦》（*Leviathan*）一書中指出，當人類在自然狀態下受到死亡威脅時，會盡一切所能來保護自身。此種設法免於暴力侵擾或死亡的作爲就是人類社會最高的必要，而權力就是實踐此「必要」的手段。因此獲取安全與獲取權力對人類而言，是一體兩面；對內，國家領導者建立權威；對外，國家要求將自己權力極大化。而國家與人民間的關係就宛如一份契約，每個人所以願意將原本的自然權力（使用暴力）交付給利維坦（國家巨靈），就是爲了使自己的安全能獲得更有效

在十七世紀末與十八世紀時，透過經濟學家之相關研究，[6] 再到啓蒙時代所強調個人的「自由與獨立自主」（individual liberty and freedom），[7] 人類安全概念的形成可謂有了雛形。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期間，人類安全的概念開始較爲具體的反映在下列幾項事實：首先是一八九九年與一九〇七年兩次海牙和平會議（Hague Peace Conferences）中所通過的一系列戰爭法規公約，這些法律文件於序文中載明一項至爲重要的條款，即「在本公約中未包括的情況下，所有平民和戰鬥員仍受那些源於文明國家間制定的慣例、人道主義法規和公眾良知要求之國際法原則的保護和管轄。」此乃著名之馬爾頓條款（Martens clause），對於國際人權的確立與維護具有重要意義，[8] 在其後許多關於戰爭或武裝衝突的條約中也均重申了此一條款（Meron, 2000: 78-89）。另外則是《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與《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此兩份文件進一步讓種族、性別、語言、宗教等屬於人民的基本福祉與權利，得到落實的可能。此外聯合國在一九六六年通過兩項重要的人權公約，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此兩公約皆規定締約國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以貫徹約文中載明之人類基本權利。[9]

除上述具有人類安全概念代表性之國際法律規範外，人類安全概念之落實，以及最重要的倡議來源，當屬一連串由國家、委員會專家、知識份子與學術界提出之報告或文件（Bajpai, 2000: 5）。譬如，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發表一系列針對「世界性問題」（World Problematique）的書籍，[10] 並於一九七二年出版《成長的限制》（*Limit to Growth*）報告書

的保證，以免於無政府狀態的不安全（1651: chapter 13-15)。

6 William Petty 與 Adam Smith 以經濟觀點強調追求人類成就與福祉（King and Murray, 2002: 2）。

7 Emma Rothschild 認爲有兩個原則構成 1990 年代的人類安全，一是對人權的堅持，另是政治上來自啓蒙時代對自由主義的關注（1995：66）。

8 另請參見本文第肆節中有關「安全文化」的舉例說明。

9 參見：http://www.ohchr.org/english/law/ccpr.htm。

10 羅馬俱樂部成立於 1968 年，爲一全球性智庫，透過百名科學家針對全球糧食、人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eadows et al., 1972），探討人類和國家何以不安全的複雜問題，諸如資源耗竭、貧困、環境惡化、對制度喪失信心、失業、以及金融和經濟體系的混亂等（Bajpai, 2000: 5）。

其次，一九八〇年代兩個獨立的機構對於「發展」與「安全」議題的探討做出貢獻。他們分別是一九八〇年的國際發展議題獨立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與裁軍與安全議題獨立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前者出版的《南北報告》（*North-South Report*），主要在於解決危機與緊張局勢，並替國家、區域、全世界人類提供有用之解決辦法（Bajpai, 2000: 6）。而後者於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共同安全報告》（*Common Security Report*），則提出有關和平與安全的議題，強調所有人類要活的有尊嚴、有和平、有足夠的糧食、有經濟與工作之能力，且生活應免於無匱乏之恐懼（Bajpai, 2000: 6-9）。

最後，冷戰的結束促動國際關係的轉變，新安全思考與新威脅來源，讓軍事事務的重要性被經濟與其它問題所取代。一九八九年 Jessica Mathews 提出環境議題與全球發展，要求擴展國家安全定義，使之延伸到資源、環境、人口等議題（Mathews, 1989: 162-177）；一九九一年 Helga Haftendorn 呼籲各國多關注非傳統安全的部分，諸如經濟、生態、國家內部等多層面的安全威脅（Haftendorn, 1991: 15-16）；其它像是強調自然環境受到威脅的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觀點也受到注目，[11] 有學者甚至將環境安全（或威脅）與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的概念進行聯結，[12] 爲冷戰後的安全研究注入更爲多元與豐富的內涵（Deudney, 1990: 461-476；蔡育岱、譚偉恩，2008a：88）。此後，像一九九一年的斯德哥爾摩全球安全與治理倡議（Stockholm Initiative on Glob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環境、科技發展等問題發表報告和研究預測。其網址可參見：http://www.clubofrome.org/。

[11] 公地悲劇一詞最初由經濟學家 Garret Hardin 提出。他以一篇題爲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文章，用經濟學的角度討論文環境議題：「公地」不僅僅指公共的土地，尚涵蓋公共水域與自然空間等（1968：1243-1248）。

[12] 所謂直接暴力是指當施暴的主體是人或團體，造成流血、傷亡，這是一種很容易察覺到的暴力，眼睛可以看得到的直接暴力，譬如因戰爭、或衝突所帶來的傷害、或死亡（Galtung, 1969: 167-191；1985: 150-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便開始呼籲一種宏觀式的安全研究途徑，鼓勵研究者擴大安全的觀察領域，探討因爲發展失敗、環境惡化、人口急速成長和遷徙，以及欠缺民主政治所造成之不安全現象（Stockholm, 1991）。另外，面對來自不同面向的各種安全威脅源，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於一九九四年提出《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13] 對冷戰結束後全球化下的安全問題進行盤點與彙整，此份文件不但促成人類安全概念在國際社會的正式形成，也同時象徵一種有別於過往傳統安全研究的新安全思維。

二、興起之原因

㈠聯合國的倡議

前述一九九四年的《人類發展報告》跳脫傳統以「國家」爲中心（state-centric）的安全觀，轉以「人」（humankind）作爲安全的強調軸心。[14] 人類安全是項概念之提出，是對傳統安全研究疏漏的補充，人類安全強調在日常生活中平民大眾「每個人」的切身權益（往往被國際關係所忽略），認爲安全應該含蓋保護一國之內的人民不受疾病、饑餓、失業、政治壓迫和環境惡化等等的威脅（林碧炤，2001：8-9）。易言之，人類安全反映出一種全方位、多層次、內容廣泛，但切合每個人實際生活的安全思考，同時容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內容，是一張嘗試解決當代人類諸多問題的藍圖，目前國際上已有若干中型國家（middle power states）正戮力實踐此一概念（Paris, 2001: 88）。[15]

㈡非國家行爲者影響力增加

冷戰結束後，非國家行爲者（Non-state Actors, NSAs）開始引起理論與實務界的進一步關注。[16] 這些屬性異於國家的行爲者在國際政治或經濟

[13] 請參見網址：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4/en/
[14] 詳細之解說可參考：宋燕輝（2001）。
[15] 詳見本文頁 66-67。
[16] 學者 Reinalda 指出，非國家行爲者涵蓋「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或多國企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隨著通訊技術的普及而逐漸增加，[17] 特別在一些國家無法單獨解決的議題上，顯現出它們的專業與機動性，甚至使得國家必須與非政府組織（NGOs）合作，共謀如何處理與緩解非傳統安全下的恐怖主義、組織犯罪、人權迫害、環境惡化、貧窮、移民、族群衝突等跨越疆界的區域性或全球性之公共議題。學者 Lester M. Salamon 稱此現象爲全球結社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18] 是一種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在全球化時代的體現。由於非國家行爲者的影響力增加，遂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特別是帶動國際社會開始增加有關個人安全的研究。[19]

㈢國際情勢變遷

二〇〇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是繼蘇聯瓦解後另一個影響國際關係至鉅的因素。一方面使得和平與衝突研究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另一方面，突顯出個人在宗教、文化、族群等方面的認同對於國際安全所具有的衝擊（Bailes, 2006）。國際情勢因爲九一一事件的發生變得更爲繁複，恐怖份子、流氓國家（rogue state）、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等問題分別在國際與國內層次對傳統的安全研究形成新挑戰，國際社會原本對抑制戰爭爆發、衝突解決與和平維持的關切，一時間轉向爲重視一國內部恐怖主義勢力的發展、宗教信仰所可能衍生之衝突、族群認同差異所造成的對立，以及國家重建（state building）等面向之研究（Jackson and Sorensen, 2007: 248-278）。諸如此類的問題雖然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國際安全，但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個人安全利益被不當剝奪或是長期安全需求到不得滿足（OECD, 2003）。

以及「政府間國際組織」等種類（Reinalda, 2001: 13）。

[17] 主要是指網路以極低的成本傳播不同的思想與論述，打破政府及傳統媒體資訊的權力壟斷，並跨越國界的進行傳送（Mathews, 1997: 50-66）。

[18] Salamon 認爲，全球結社革命在 20 世紀末開始蓬勃發展，從先進的北美、歐洲區域到發展中的的非洲、拉丁美洲與前蘇聯地區，其興起的意義不亞於 19 世紀末的民族國家，這些組織或機構不斷的擴散，將可能對未來國家間與公民間的聯繫造成深遠影響（1994：109-122）。

[19] 有關非國家行爲者部分，可參考姜家雄等（2007：115-144）或 Bruderlein (2000)。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㈣全球化的效應

全球化引發的效應甚多，本文主要著重於時空的壓縮現象和一種對遠方的影響性（張家銘等譯，1997：144；Kim, 1999: 17；Held et al., 1999: 16）。詳言之，全球化的世代裡，某一區域的人、事、物會對其他地區的人、事、物產生影響，其時間之快且幾乎不受地理疆界的限制。同時，全球化的效應是一個主語不明的多元現象，經濟全球化固然是主軸，主權國家儘管仍然重要，但社會、知識、觀念、文化、甚至疾病與犯罪等各層次的相互聯繫，以及前述非國家行爲者的頻繁互動也同時在進行全球化。這使得有效維繫與確保安全的難度增加，同時安全開始形成難以分割的概念，國家的主權和疆界面臨全球化的強烈衝擊而不在絕對與清晰，內部性的威脅或是自招的威脅，可能遠比來自於外部的威脅更具有殺傷力。[20]

參、國際關係中的安全思維

國際關係學門的理論發展與安全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無論主流抑或非主流的國關理論，皆有對安全研究做出豐沛討論和貢獻。惟主流理論的安全研究對於人類安全的論述不多，蓋其醉心於「國家的」安全，認爲個人依附於國家，毋需獨立出來討論。相較主流理論對個人安全的輕忽，本文認爲建構主義的安全思維值得被推廣與採用，因爲建構主義思維下的安全，並不像主流理論中的現實主義（Realism）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所理解的那般，具有先驗（或給定）的特徵與純物質性事實，而是一種相互主觀與共構（co-constituted）的社會文化展現。在此種安全思維下，規範（norms）、認同（identity）或共享的知識（shared knowledge）可以賦予安全內涵許多不同的可能，有益於人類安全此種新安全概念的形塑與發展，並爲目前關於安全的合作或衝突論述，提供進一步驗證的契機。

[20] 內部的威脅例如一國之內戰，自招的威脅則可以是因爲進口不安全的商品而導致國民健康面臨風險，或是爲了吸引外資而以犧牲環境作爲代價（蔡育岱、譚偉恩，2008a：172-176；譚偉恩，2008：7-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主流理論的安全思維

以人性本惡作爲安全分析的基點，將權力視爲國家追求的目標和界定利益的基礎，一直是現實主義的理論核心。儘管爲了理論科學化的需要，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修正了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有關人性方面的側重，但在權力的重要性和國家中心的思考上並沒有改變。不過，相較於古典現實主義對於權力的著重，新現實主義更關注國家「安全」的獲得，認爲國家對外交涉的立足點是如何維繫生存而非如何將權力最大化。新現實主義系統性的對國際安全提出論述，從物質的體系結構來解釋國家行爲，並將權力平衡作爲維繫國際秩序的有效方法（Waltz, 1979）。這是一種結構形塑論，十分著重從無政府狀態和國際體系的結構（即國家間權力的分配）來解釋與認知國際關係中的安全議題，對於規範沒有投以太多的注意，甚至輕忽規範或制度對於國家行爲的影響（Mearsheimer, 1994: 5-45）。此外，作爲一種「體系理論」，新現實主義的分析層次聚焦在國際體系，關注的是國家間權力消長（特別是軍事權力）所導致的體系結構性改變，個人及其安全這種屬於國內層次的問題，對於國際體系的結構不具有影響力，自然不在討論的範疇之中（宋學文，2001：85）。

自由主義的安全思維則可追溯到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 or Idealism）的相關論述，[21] 該理論主張，個人應該作爲社會理論的基礎，因爲只有個人才是真實的，而社會只是一個抽象概念（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2001: 29）。此種觀點來自於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與反對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歐洲興起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有關，例如 Adam Smith 認爲人的行爲大多出自於自私的動機，個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時，無意中也

[21] 古典自由主義在安全研究中，其實較側重探討集體安全。集體安全是指在國際體系中，所有國家共同締結多邊條約或參加某一機構，這是一次大戰後產生的安全模式，若干國家共同努力以預防或制止戰爭發生，並藉著軍事綏靖來達到嚇阻潛在性侵略者的擴張，目前集體安全機制最具代表性的實踐當屬聯合國。此外，學者 Charles Kupchan 與 Clifford Kupchan 認爲在集體安全下，這種「全體對抗單一」（all against one）的構想比「人人爲己」（each for his own）更爲有效（Kupchan, 1991: 52），因爲在集體安全制度下，國家更願意遵守某些規範，維持安定，並於必要時並團結起來對抗侵略（Kupchan, 1995: 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促成社會福利。渠氏認爲，自利（self-interest）的個人在市場機制引導下可以有效配置資源，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政府因此不該干預人民的經濟活動（Bronowski and Mazlish, 1960: 352）。有別於古典自由主義，且基於理論自身科學化的追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sim）對於個人因素的分析減少了，更遑論探討個人與國際社會兩者間的關聯性（Simon, 1995: 23-24）。不過在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與合作（cooperation）這個部分，[22] 新自由主義指出，民主觀念的普及和能夠改善國家被欺詐（cheating）的制度，將有助於國家之間採取非暴力或合作的互動方式以達成政治妥協和國際秩序的維持。有論者甚而進一步解釋國際制度（intl. institutions）與國家內部民主關係的重要性，強化了民主認同與人權觀念（Macmillan, 2004: 472-493），形成有別於新現實主義的安全思維。惟新自由主義對於觀念或規範的關切是基於此兩者能否展現物質有形的作用；亦即，觀念或規範只是被用來彌補物質權力和利益在解釋力上的不足（陳欣之，2004：114）。此外，國家有時對於一項制度的參與是基於地位或權力的考量，例如冷戰後若干東歐國家經由加入北約（NATO），來表彰自己有別於冷戰時的國家地位或權力（Ene, 1997: 8-11）。

二、建構主義的安全思維

建構主義最早涉及有關安全的議題，應屬安全社群（security community）。此概念係由 Karl Deutsch 提出並應用於國際關係，之後經 Emanuel Adler、Michael Barnett 等學者的研究而更爲完整和周延（Smith, 2000: 87-88）。Deutsch 認爲有兩項要件是安全社群存在的前提：一是價值觀的一致，像是政治觀念或經濟觀念；二是具有共同的反應性，譬如共同的情感、認同等（Deutsch, 1955）。Adler 與 Barnett 則將安全社群的形成分爲三個階段，從初期（nascent）協調彼此關係以增加相互的安全，到成長期（ascendant）以緊密的網絡、集體認同感的形成使彼此威脅感降低，乃至最後成熟期（mature）得以出現高度信任，並發展出社群身份與屬於

[22] 1983 年 Michael Doyle 正式將民主和平作爲一種理論提出（1983：323-353）；另外 1993 年 Bruce Russett (1993) 對民主和平論作了系統性的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群的安全認知（Adler and Barnett, 1996: 63-98）。

建構主義與前述主流國關理論安全思維的最大不同在於，認爲「安全」是一種社會建構，可以透過能動者的互動實踐去改變彼此的主體間關係屬性，進而賦予無政府狀態不同的文化內涵。毋寧，在建構主義的安全思維裡，能動者的身份可以是安全困境中的競爭者（新現實主義）或合作夥伴（新自由主義），但更可以是安全社群中的一份子。所謂安全社群係指，社群中的成員確信彼此間不再以武力相對，而是以其他方式解決爭端和利益衝突。這種社群由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爲基本成員，但在互動過程中形成彼此共同的價值觀或制度，因此和平狀態的維繫具有可預期性（Adler and Barnett, 1996: 1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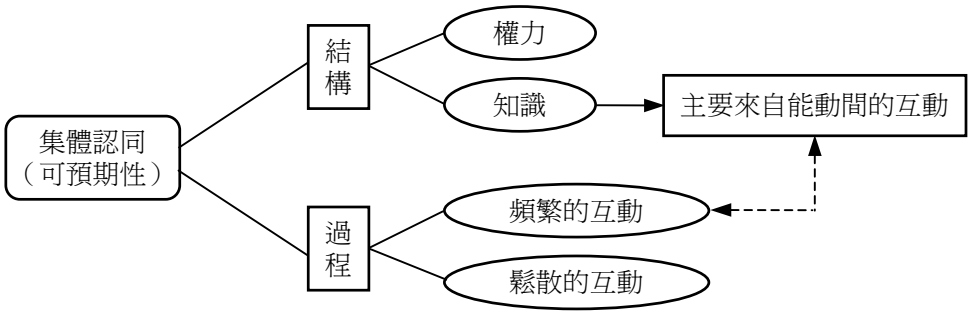
「可預期期性」（或是「不確定性的降低」）原則上有兩種取得方式；一是行爲體經由成本收益的理性計算取得，此爲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一是在能動者對利益有共同的理解或認知的前提下取得，這是社會建構論的思考。這裡吾人不難發現，相較於前述新現實主義的客觀物質結構形塑論，建構主義是站在主觀的認知結構形塑論立場。但應注意的是，一個安全社群的結構並非「只有」能動者彼此間的主觀認知，尚有能動者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和與內部其它能動者間的相互構成實踐，也就是說仍有一定的客觀物質成份，只不過這種物質因素必須經由主觀認知的理解後，才具有意義。Adler 和 Barnett 把「可預期期性」，也就是能動者在互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集體認同，歸因爲結構和過程兩個面向（請參見圖 1）。前者包括權力和知識；權力是建立安全社群的一個重要因素，大國可以利用其權力來敦促其他國家行爲不逾越一定的尺度，例如北約中的美國。但權力同時也具有規範的意涵，大國透過滿足小國的期望或是一定的責任承擔，便能在互動過程中獲得認同與合法性（legitimacy），使小國心甘情願地接受它的安排或要求，進而建構起社群成員間的共享觀念（Beetham, 1991；Barker, 1990）。[23] 至於知識，指的就是能動者之間共有的觀念或理解，這主要來自能動者間的互動。惟互動必須經由另一個面向，即過程，

[23] 事實上，合法性概念的探討並非專屬於建構主義，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也同樣對此概念有所研究，參考 Clark (2003: 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能獲得實踐之可能。過程中若能動者間的對話、溝通，及相互模仿或學習越頻繁或越深入時，社群的動能性密度（dynamic density）就越強（Ruggie, 1983: 148）。[24]

圖 1：集體認同的兩個面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上述的結構其實就是主體間相互性質（intersubjective concept）的體現，它並非個別能動者認知的總合，而是一種在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共享知識或集體認同，因此與原本單一能動者本身的個體認知已不盡相同。若我們將這樣的安全思維應用到現實的國際關係，那麼在一個安全社群中，儘管國家是最主要的構成員（能動者），並且在法理上享有所謂的國家主權，但這個「主權」的實際效能將會因不同安全社群中共有知識或認同的差異而有所不同。[25] 例如歐盟（EU）與東協（ASEAN）均具有安全社群的屬性，但前者對於「主權」的理解顯然與後者是不同的（Stapel, 2008）。簡言之，雖然安全社群的形成沒有威脅到主權國家的地位或是取代民族國家，但當社群共同體互動越頻繁或結構越緊密時，能動者間的安全互賴性和難以分割性就越高，此時「個別的」或「獨立的」國家安全範疇會呈現縮小化的趨勢，而「集體的」或「不可分割」的社群安全範疇則漸漸浮現與被形塑和強化。[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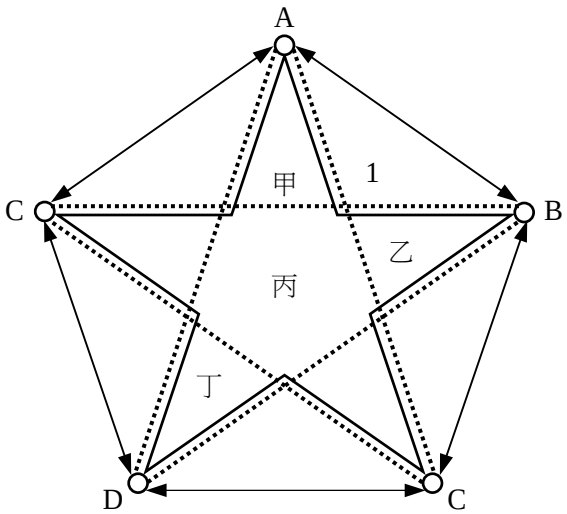
[24] 但此概念最早係由 Emile Durkheim 提出，可參考 Durkheim (1984)。

[25] 建構主義的代表學者 Wendt 便曾指出，物質因素只有透過被鑲嵌在結構中之共享知識的理解，才會具有意義（Wendt, 1995: 73）。

[26] 新自由主義也有類似的觀點，只是比較強調互賴增長的現象有助於安全制度（secur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互動頻率與能動者間的安全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示說明：

ABCDE 分別代表國際社會中的能動者，它們彼此間的互動從最鬆散到最頻繁間有許多不同的可能。以 ABD 間的關係爲例：⑴三者間可以沒有任何往來，安全關係就是圖中個別獨立的小圈圈；⑵ AB 互有往來，但均不與 D 互動，安全關係就是 AB 間的實線雙箭頭（頂多加上 1 的部分）；⑶ AB 互有往來，但僅其中一方（假設是 B）與 D 有互動，則安全關係是 AB 間的實線雙箭頭＋BD 間的虛線≒「1 乙丙丁」。儘管 A 與 D 沒有直接往來，但可能因爲 B 的存在，而有間接的互動，使得彼此的安全產生聯繫。譬如 AD 間沒有貿易往來，但分別與 B 進行貿易，則 AD 的商品（或服務）可能透過 B 而輾轉（或加工後）進入對方市場；⑷ ABD 相互間均有往來，安全關係呈現「1 甲乙丙丁」，但其中 AB 互動又更頻繁些，所以圖型中甲乙靠近 AB 部分的顏色較深，丁靠近 D 的顏色較淺。

三、不同安全思維間的比較

針對上述兩種類型的安全思維，本文認爲，現實主義中的古典現實主

institution）的重要性。參考陳欣之（2004：114）；而本文則比較強調互賴增長的現象有助於不可分割的安全概念形成。參考本文圖 2，頁 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雖有談論個人，但其目的在於借用人性（human nature）來解釋國家行爲，對於個人安全的部分則是排除在討論之外。相較於古典現實主義對於「權力」的著重，新現實主義更加側重「安全」，因此深化了對安全的相關研究，然受限於兩極對峙和恐怖平衡的客觀國際時空情勢，它的安全研究關注對象是結構因素與軍事安全，對於個人安全的探討同樣採取忽略或莫不關切的立場。至於古典自由主義雖然主張個人應該作爲社會關係的基礎，但因發展歷程中受到古典經濟學的影響，較爲強調商業性利益或財富累積，使得安全的探討多侷限在經濟事務（Sally, 1998: 16-35）。而新自由主義雖然對於民主制度與國際安全事務的合作有所強調，但因將焦點置於國際制度，以致在關於個人安全的研究成果上顯得貧乏。

相較之下，建構主義的安全思維具有比較多的「可能性」。因爲對於安全是項議題，建構主義認爲文化與規範這種較爲主觀層面的因素是影響能動者彼此間利益與安全的重要關鍵，具體一點來說，就是國際社會中的無政府文化（注意，建構主義強調的是無政府的「文化」，而非單純的無政府「狀態」）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性，每一種可能性都是由關於能動者彼此間不同的共享知識或理念建構而成，也都有一種運作的規範或是邏輯。此種文化以及規範會形塑國家的認同，進而影響國家對於「安全」利益的界定和對外政策行爲，而這種行爲又再加強了原本的認同，使得某一種無政府狀態文化的「可能性」隨著時間變得更加牢固（Wendt, 1999: 246-251）。當然，這個時間歷程並不是單向的，而是體系之下的能動者（或社群之中的成員）彼此間互相影響同時又與他們所存在的體系結構相互建構的雙向模式。另外，由於建構主義具有批判理論的性質，[27] 因此不認爲有先驗的（the given）權力結構決定國家（或其它能動者）的安全觀，而是國家彼此間與國家和國際社會相互間的認知與規範，才是主導國家安全政策的關鍵因素，這些認知與規範塑造了國際體系中的對抗或合作關係。簡言之，國家可以透過不同的互動方式及其作用，來建立不同的共享認知與共有規範，進而形塑出符合大家實際需要和需求的社群安全利益，制約個別國家狹義的自我安全滿足或是純私利性的安全政策與行爲。

[27] 請參見本文頁 62 的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主流國關理論與建構主義的安全思維比較

	主流國關理論	建構主義
對國際「社會」的理解	無政府狀態與物質結構	社會結構有三個成分，分別是共享知識（share knowledge）、物質資源（material resource）與實踐（practice）（Wendt, 1995: 73）
國家利益觀	基於理性考量的功利式利益觀	國家利益是在彼此互動的過程中生成，有互動才會產生利益。[28]（Mercer, 1995: 231-235；Katzenstein, 1996: 2；袁易，2004：37-38）
對外行爲	現實主義以自助爲主，自由主義以互助（合作）爲主	由彼此互動後產生的文化（一種集體認同）決定採取進攻型、競爭型、或友好型的外交政策
能動者／行爲體與結構的關係	結構制約行爲體；不同體系的結構決定了國家的行爲。例如兩極體系與多極體系對於國家的影響便不同。因此結構和行爲者間是單向關係。	能動者與結構間是相互依存的互動關係。同時體系中能動者的交往模式有可能導致結構文化的轉變。因此結構和動能者的互動是雙向關係。（Ruggie, 1983: 261-285；袁易，2004：35-5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透過以上的說明，吾人可以發現傳統的國關理論有兩個原因導致其不適宜或難以解釋人類安全這項概念：⑴無論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均是國家中心論的支持者；[29] ⑵物質決定論加上先驗的無政府狀態安全認知，

[28] 建構主義重視觀念、規範、認同、文化等概念，認爲其中的主觀因素影響力不可忽視。它們背後代表國家共有知識的形成，是一種對客觀世界的主觀認知，與利益的重新界定（Finnemore, 1996: 128）。

[29] 新自由主義雖然也討論其它行爲者，例如跨國公司，但整個理論的主軸和學術研究還是以國家和由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爲核心。同時對於弱勢的個人權益少有關懷（Pramono, 1998: 115-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使得安全概念的內涵呈現靜態與難以變動的特徵。此外，雖然自由主義（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強調合作式的安全觀，但因爲合作的基礎是有利可圖、是合作所得大於不合作所失，以致一旦無利可圖或是不合作更有利於國家時，合作的機制就面臨解體的危機（Ikenberry, 2001: 109-112）。反之，建構主義的安全思維雖同樣討論國家，但個人、跨國公司等能動者也均是該理論指涉的社會個體（鄭端耀，2001：205，213-214）。在國家利益與安全認知方面，建構主義指出影響國家的無政府狀態體系並非客觀與先驗的存在，而是國家互動之後一種集體認同的展現。此種認同將賦予無政府狀態內涵上不同文化的可能性，而國家的行爲是受到這種無政府文化的認知制約，而不是純粹無政府狀態的物質制約。換言之，建構主義所以較傳統國關理論適合用來詮釋與研究人類安全，係因爲它在本體論（ontology）上不具有專斷性，並且呈現對於「異己」的包容力，容許不同的可能性存在。毋寧，相較於以國家爲中心和以物質爲本體論的傳統國關理論，建構主義可以發展出一套對於弱勢者、難民、小國、或被施暴族群的倫理學（石之瑜，2001：297-300），從而形塑出具有「人性」的安全觀。

肆、人類安全：建構主義的詮釋

與人類安全概念的提倡在時間上略有雷同，建構主義於一九九〇年代開始獲得國際關係學者青睞，其原因主要在於該理論提出一套經驗上可以解釋冷戰後國際政治現象的說明，補足主流國關理論在國際政治上對於社會性和文化等因素的忽略（Walt, 1998: 29）。此外，建構主義在國關領域的興起與一九八〇年代一波新的研究趨勢有關（倪世雄，2005：221），此時期不少學者面對全球局勢的轉變而萌生理論突破與超越的企圖心，希望提出更爲貼近國際政治脈動的解釋。[30] 本節承繼前一節之說明，嘗試由

[30] 第一個將「建構主義」引入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是 Nicholas G. Onuf，他在 1989 年出版《我們建構的世界：規範以及在社會理論與國際關係中的規則》（*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書，以語言和規範作爲建構主義的核心（Finnemore, 1996: 4；Ruggie, 1998: 862）。不過，在 Onuf 的研究問世前，1987 年，Alexander Wendt 在其論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結構—動能者問題」（The

建構主義來詮釋人類安全，並輔以該理論中的「集體認同」、「國家偏好」、「語言與規範」，以及「安全文化」等觀點來加強論理之依據。

一、建構主義的思想基礎與內涵

除前已述及的建構主義安全思維外，該理論本身獨特的思想基礎與內涵也是其較主流國關理論適合用來詮釋人類安全的另一原因，故有必要略做說明。

建構主義的思想基礎，分別來自社會學、語言學與國際關係。其中在社會學方面，如果說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是從經濟學擷取養分，那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則是從社會學獲得啓發，並可追溯到十八世紀義大利哲學家 Giambattista Vico，以及之後的 Immanuel Kant、Emile Durkheim、Max Weber 與 Anthony Giddens 等人的思想（Jackson and Sorensen, 2007: 163-164）。例如 Durkheim 對觀念的重視，將觀念視爲社會世界（social world）的核心；Weber 強調人具有賦予社會意義（sets of meanings）的特殊能力，指出人的行爲意義是觀念的範疇；Giddens 提供解釋結構與能動者互動的理論，說明兩者之間是一種相互構成的關係（肖鋒譯，2006: 94-119）。

語言學則是建構主義內涵中另一個重要的成分，也是建構主義和反思主義（Reflectivism）、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有所相似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反映在本體論上的見解。依據學者們的看法，語言是一種社會制度，是人類建構社會事實不可或缺的工具，任何事實都有語言成分的存在。語言構成行爲體間的共識，繼而從共識中產生集體意象（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然後形成知識、制度與規範（Ruggie, 1998: 869；Searle, 1995: 59-60；Kratochwil, 1989: 21-27）。人們借用語言、文字、圖像、符號等社會工具，去解釋他們所觀察到的外部世界，故而世界是被演繹出來的，而非可以實證的。此種以「詮釋」（interpretation）方式解釋人與社會、國家與國際社會間關係的思路模式，成爲建構主義十分重要的學理內涵。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中，便已對此略有探討，只不過他認爲建構主義的核心是有關動能者與結構間互動的問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國際關係的研究部分，曾有學者把建構主義、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反思主義、後現代主義等非傳統或非主流的國關理論化約爲批判理論（Mearsheimer, 1994: 37）。例如 Ted Hopf 以建構主義受批判理論影響之程度差異，將建構主義分爲傳統派建構主義（Conventional Constructivism）與批判派建構主義（Critical Constructivism）（1998: 171-200）。其中後者所展現的社會學與語言學內涵尤其明顯，加上受到 Georg W. F. Hegel 思想的影響，將因果概念區分爲自然因果（causality of nature）及命定因果（causality of fate），認爲前者是無法被改變的，但後者只要人類在意識上有所覺醒便可加以轉化（Hassing, 1997: 7-8）。另外從建構主義的代表學者 Alexander Wendt 對於該理論的定位來看，建構主義與後現代理論和女性主義（Feminism）是同一類型的理論（Wendt, 1999），亦即希望透過對於事實的批判與否定，喚醒群眾（尤其是弱勢者）的意識，進而破除假議題，找回被壓抑的自發性，最終是對社會不公平或不正義的現象加以改革。

尚有一點值得提出說明的是，建構主義的「科學性」問題。追求科學並以之爲基礎是二次戰後國關理論的一項特徵，但科學本身的特性是一種工具理性，若只在純技術的範圍內操作，並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若將之作爲衡量所有知識或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也就是把凡事都化約爲科技意識來處理，便失其妥當性。建構主義作爲一種理性主義和反思主義間的橋樑（via media），一方面接受實證主義的立場，但一方面反對在方法論上拘泥於因果邏輯關係和不接受設證推論（abductive inference）的堅持。建構主義引進科學實存論（Scientific Realism），將證明因果機制的標準放寬，在不否定科學的前提下，強調與人性的共同意識相結合，以避免科學的專斷成爲一群人宰制另一群人的幫兇（鄭端耀，2001: 205-206；Acuff, 2007）。

二、以建構主義詮釋人類安全

爲進一步勾勒建構主義與人類安全的關連，本文試著以 Wendt 的集體認同看法、Martha Finnemore 國家偏好改變、Nicholas Onuf 所強調的語言與規範，以及 Peter Katzenstein 的安全文化等四項觀點切入，作爲詮釋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安全的論理基礎。

㈠集體認同

Wendt 認爲國家間的互賴現象有助於集體認同的形成（Wendt, 1999: 347），並在集體認同產生後，進而促進合作關係的發展。Wendt 的研究並沒有全盤否定物質因素的影響力，但卻闡明了國際政治是有關能動者認同與利益的再造和轉變（Wendt, 1996: 59-62）。循此，對於人類安全此一概念的共識產生便是建立在一種共同價值的合作基礎之上（Tadjbakhsh, 2007: 4-6），並隨著不斷互動與合作的實踐，而變得更加明確和具體。

以環境安全爲例，一九九四年《人類發展報告》率先提出環境是人類獲得安全的基礎前提之一，強調儘管發展中國家的潔淨用水問題和已開發國家的空氣污染問題屬於不同種類的環境威脅，但結果卻是極爲相似且相互影響，對人民的生命財產構成日益嚴重的損害與威脅（UNDP, 1994: 28-29）。若干年後，國際社會在歷經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成立與隨後貿易自由化的加速、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的訂定與暖化現象的加劇，以及水資源問題所造成的政治緊張和衝突後，已普遍接受且認同在經濟活動緊密互賴的情況下，彼此的環境安全已不是可以分割的利益，而是必須齊心維繫的共同價值。此一集體認同的形成與強化，或其所促成的具體環境安全規範，可以在一九九六、一九九八、一九九九、二〇〇〇年的《人類發展報告》和二〇〇五年前聯合國秘書長 Kofi Annan《大自由》（In Larger Freedom）的報告內容中找到佐證。其中二〇〇〇年的《人類發展報告》更是特別以「人權和人類發展」爲主題，將經濟、人權、環境三者間的關係做了詳細的說明（UNDP, 2000: 1, 31, 37, 84-87）。

㈡國家偏好

Finnemore 在其《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Theory*）一書中，以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作爲方法進行研究，指出國家因爲身處國際社會的網絡之中，其行爲會受到國際社會的觀念、制度和價值的限制，並隨著時間而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變本身原有的偏好（preference）。但主流國關理論僅以國家利益爲假設前提，對國家偏好卻未加聞問。對此 Finnemore 提出質疑，認爲國家偏好並非全然內生的（endogenous），而是某一程度上來自外部，並認爲國際體系下結構不限於物質結構、權力結構，還包括意義與價值結構。因此，國家利益並非被給定的（given），而是經由社會互動所建構的（Finnemore, 1996: 1-33）。簡言之，國際社會的規則、制度和價值影響國家的利益，並對國家行爲發揮程度不一的限制，甚至是改變國家原本的偏好。[31]

以人類安全爲例，一九九四年《人類發展報告》對人類安全所揭櫫的七大項目，即爲一種以人爲中心導向的利益確立和觀念建構，並在該組織的倡議和推動下，在國際社會中產生具體實踐，從而使國家改變其偏好，並促動日後「人類安全網絡」（Human Security Network）的形成。[32] 此外，由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近期調整與方式修正觀之，衝突預防或是所謂的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正日益受到重視，並在本質上有某一程度的人類安全偏好出現，除了原本由成員國或經由安理會授權區域性國際組織承擔維和任務的基本模式外，近期的維和行動包括經由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及政治事務局（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ffairs, UNDPA）參與進行的衝突預防與和平建立，以及促進國際合作與國家發展的新實踐。[33]而 James I. Walsh 在他的研究中也指出，歐洲國家在貨幣整合的議題上展現出一種社會化指引歐盟會員涉入特定行爲偏好的現象。因此總的來看，社會化是一種誘導行爲者採行某一社會所偏好的規範，進而改變其原本行爲或偏好的機制（2001：59-80）。

---

31 Martha Finnemore 並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紅十字（International Red Cross）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三案例，描述新的觀念、偏好在國際社會建構的過程，從經驗上證實社會規範對國家行爲產生的影響。

32 目前會員共有瑞士、奧地利、智利、希臘、愛爾蘭、約旦、馬利、荷蘭、挪威、泰國、哥斯大黎加，以及斯洛維尼亞。請參考「人類安全網絡」網址：http://www.humansecuritynetwork.org。

33 例如在菲律賓與印尼，UNDP 幫助流離失所的民眾建立基本生活需求能力；UNDPA 則以維和及預防外交等方式希望能達到預防衝突的效果。這些綜合性的衝突解決與和平建立方式，似已成爲聯合國近來在區域衝突與和平維繫問題處理上之基本模式。相關資料請參考 Annan (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㈢語言與規範

Onuf 以建構主義爲研究社會關係的方法，指出「人爲社會中的人，若無社會關係存在，人即不能被稱爲人。換句話說，因爲社會關係存在，使人類形成，人類創造社會，社會孕育人民，這是一種雙向過程……，人民經由實踐產生『規範』（rules），並透過它將人與社會聯繫起來（1989：58-61）」。此觀點主要是以人與社會間的聯繫當作研究起點，強調兩者透過規範（或規則）來建立關係。而規範是人類使用語言（speech act）所詮釋出來的產物，是人類建構社會最重要的一種方式，經由語言發揮實際的影響，最終達到知識建構之目的（Onuf, 1989, 60-62；229-233）。簡言之，Onuf 十分強調語言對人、利益與社會的建構作用，把語言視爲建構主義理論的核心。Bedeski 將此觀點進一步深化，指出人類透過語言來架構知識，將自身對於安全的需要轉化爲有關安全的知識，就像人類安全概念的提出一樣，從個人層次的「認知」（cognitive）到國際層次的「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經由不斷互動與相互建構之後，以另一種語言來表達不同於傳統安全的人類安全知識，最終則是希望在國家間形成一種被認同的人類安全規範。（Bedeski, 2007: 45-48）。

然而，考量人類在形成認知與知識時必須透過語言的事實，有論者因而認爲，人類在語言使用的過程中總是習慣性的把自己設定成主體（subject），因此語言和語言所建立的知識或規範在本質上是主觀的，而語言的使用，即具體的溝通行爲將難以避免造成主體與客體的二分或對立現象（Bruner, 1986: 43-44）。此種情形在人類安全概念的推動過程中也同樣難以避免，因爲人類安全的研究文獻目前仍多屬於北方先進國家的學術成果，當中所陳述之論點或是建議的方法具有相當程度的北方色彩；但研究案例卻可能多來自於發展中國家或落後國家（像是非洲國家的愛滋病問題）。惟南方國家或非北方國家的人類安全問題是否全然適合以北方國家的角度來分析，恐怕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Nhema, 2006: 193-1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㈣安全文化

Katzenstein 是以「文化」作爲研究主軸，探討主流國際關係所無法有

效克服的安全問題。[34] 隨著區域整合發展逐漸熱絡，他將制度與認同運用在比較政治與區域研究上，認爲「文化」是一套規範和認知的標準，這些標準定義了體系中的行爲者，以及行爲者間與社會互動之關係（2005：6）。在 Katzenstein 安全文化的理論中，文化被定義爲民族國家威權與認同的集體模式，並反映在社會習慣與法律上。傳統國關理論所以沒有預見蘇聯瓦解和冷戰的結束，主要便是因爲沒有從國家的認同和利益進行分析，忽略了文化的作用。Katzenstein 的研究指出，國家並非單一體的行爲者，而是集合體，國家的利益要在互動中形成，是一種文化的產物。他以日本爲例，指出在經歷二戰與軍國主義的失敗後，國內不同的意見與聲音讓國內產生激烈的爭論，經過一段時間的內化與政治角力後，逐漸形成新的集體認同，轉以追求經濟發展作爲國家的安全文化和首要目標（李曉華譯，2002）。

本文認爲，人類安全所傳達的也是一種「文化」的作用，此種文化將安全界定爲一種需求與權利相綜合的母體（matrix），透過此母體，個人與社會（或國家）的價值皆能得到落實，進而益於組織型態的漸進發展，最終讓問題習慣以集體的形式獲得解決（Ginkel and Newman, 2000: 60）。以國際社會對於人權的尊重以及對於國際人權法律規範的遵行來看，早期國際法學家即已提出騎士精神（chivalry）的觀點，認爲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一種「騎士精神」文化的體現。chivalry 是從法文 chevalier（騎士）一詞轉變而來，強調忠誠、勇氣、慷慨和不爲殊死戰鬥；言下之意，戰爭並非單純的武力行使，還要時時展現道義。此項原則具體適用於戰爭或武裝衝突時，便是把交戰國的人民分爲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後者不得殺傷，前者雖可殺傷，但對傷病人員及被俘的戰鬥人員則不得爲之（Perry, 2006）。由此例證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傳統安全最爲重視的軍事領域其實不乏相當程度的人權與人道思維，也就是說，國際社會在歷史的實踐過程中，對於戰爭和武裝衝突有一套屬於保障個人安全的文化，而此種文化隨著時間的演進和當代人類安全概念的提出得到不斷的強化，並反映在現在的國際人

[34] Katzenstein 將社會文化觀點應用於安全研究，提出文化建構國家認同，改變國家利益與行爲的說法（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法、人權組織和國家的實踐中（Ratner, 1998: 49-76）。[35]

三、小　結

總結上述不同學者的觀點（請參見表 2）後，本文認爲建構主義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補綴，某程度上在人類安全對於傳統安全研究的增補過程中被體現出來。一方面反映後冷戰時期傳統國際關係在研究上的力有未逮，一方面說明「權力」決定「國家利益」，進而限制「國家行爲」的觀點，未必依舊是當代國際政治與國家行爲的鐵律。

表 2：建構主義學者的觀點及其與人類安全之關聯

學者觀點	論述主軸	內　　涵	對人類安全的詮釋
Wendt	集體認同	互賴關係的增強有助於集體認同的形塑，進而促進無政府狀態的文化朝向和諧關係發展	互賴關係下的集體認同有助於人類安全概念的實踐，並在過程中強化不可分割的社群安全認知。目前國際社會對於環境安全的集體認同便是一例
Finnemore	國家偏好	質疑先驗的國家偏好，認爲規則、制度和價值會影響國家行爲與改變國家偏好	偏好的可能改變爲「以人爲本」的人類安全思考提供論述與發展的可能性
Onuf	語言規範	語言作爲溝通的重要工具，在互動過程中與知識和權力不可分，並能形塑某種社會規範	透過倡議「人類安全」的語言，形塑新的安全知識，進而在能動者間建構有別於「國家中心」的安全規範，但可能無法避免語言使用過程中的專斷性與主／客體間的對立結果。
Katzenstein	安全文化	文化建構認同，認同改變國家的安全觀或是利益的判定，進而影響對外行爲	何種安全需要獲得保障是在行爲者互動過程中確立的，是一種社會文化建構下的產物。就像早期人類安全的文化反應在戰爭或武裝衝突中，而現代的人類安全文化應有更多適用的領域與空間。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35] 另請參考「國際紅十字會」網站，網址：http://www.icrc.org/ihl.nsf/FULL/170?OpenDocumen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上述關於建構主義的說明，人類安全是項概念的形塑或形成與建構主義的契合度遠較傳統國關理論來得高些。在建構主義的安全思維下，除了反映人類對社會關係的一種重新認知外，也象徵一種安全概念的轉向。本文依循建構主義的內涵脈胳，提出六個觀點作爲對人類安全此一概念的詮釋。

建構主義認爲知識是一種社會建構，從而引導出知識的本質與社會意義仰仗人類的知覺，而知覺左右著人類的行動。因此，人類對於威脅的知覺與理解，決定了安全概念的具體內涵爲何。惟傳統安全研究透過「國家」把「個人」吸收，隱藏了個人對於安全的渴求，同時認爲國家安全的確保是個人安全與否的當然前提。此種安全觀與人類社會建立國家的初衷、當前全球化時代國際關係的發展、以及安全威脅來自於國家內部的情形顯然有違，有必要加以修正（蔡育岱、譚偉恩，2008a：162-164；170-171）。

既然「人」才是安全的始終關切與指涉對象，則人類對於威脅的知覺與理解，便是構成安全概念具體內涵的基礎。但應留意的是，此種個人對於安全的知覺是建立在一種共享的知識或共有的觀念上，也就是說人類安全是人類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皆能同意、接受、且實際需要的集體認同。而不是少數人或權勢優位者自行定義或專斷之下的安全概念。

人類安全如同是安全研究領域中的一種新語言、新符號，由於語言建構社會事實，任何事實也都具有語言成分存在，而語言又是能動者間溝通的基礎與行爲時的共識，共識催生集體意象，進而形成社會文化與規範。故當國家作爲能動者在國際社會的互動歷程中進行交往時，若動能性密度越強的時候，能動者間的安全互賴性和安全難以分割性就越高（請參閱圖2），此時「個別的」或「獨立的」國家安全範疇會開始縮小，而「集體的」或「不可分割」的社群安全範疇則漸漸得到強化，此時作爲共有觀念或集體認同載體的人類安全概念就獲得發展的空間。

對於人類安全的認同來自於社會實踐過程中觀念的建構。這些認同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著互動過程中能動者往來模式的變化與所處環境的改變，而有所調整。就好比一九九四年的《人類安全報告》對於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定義是，「所有人在所有時刻，均有實際上和經濟上的能力獲得所需的食物」（UNDP, 1994: 27）。但從一九九六年迄今，糧食安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全定義不斷修正，目前納入了食物品質、營養、與農業的關係、與貿易的關係、以及與氣候變遷的關係等新安全內涵（UNDP, 2008, 11-42）。

建構主義下的人類安全可以說是安全研究領域中的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一方面對傳統政治、經濟、主權國家、政治社群等觀點提出質疑（Newman, 2001: 247），一方面將新的可能性引入安全研究，也就是幫助原本在以「國家爲中心」的安全思考下被壓抑之弱勢群體得到解放（emancipation），讓安全的內涵多樣化並且貼近生活的現實。[36]

最後，建構主義下的人類安全並不會也無意挑戰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37] 相反的，人類安全概念的提出，可以幫助國家更精準的檢驗是否落實真正的安全。在國家間戰爭爆發可能性較低的當代，一國境內的戰爭（civil war）、移民、移工、或離散者（diaspora）等內部威脅源，恐怕才是侵擾國家安全，甚至區域安全的問題所在（蔡育岱，2008；Adamson & Demetriou, 2007: 489-526）。

伍、人類安全：一種新安全概念

透過關於建構主義的相關說明，我們可以了解非物質性的因素，像是觀念，是如何影響個人、國家、或其它能動者的行爲，但同時也不忘將結構與成員在時間歷程中的雙向互動列入觀察。在這兩條主線思考之下，本文進一步試著闡明人類安全如何在國際社會中形成一種新的安全概念並在國家實踐中得到強化。

---

[36] 臺日最近有關釣魚臺主權的爭執在某程度上便是「國家中心」安全思維的體現，而不是「人類中心」安全概念的落實。我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於漁民「漁權」的照顧是忽略的，每每只在「主權」有所爭議時，才展開行動。自 1971 年政府宣佈釣魚臺是中華民國領土以來，民間的保釣行動比政府更爲積極與認眞，但也多屬悍衛「主權」性質。時至今日，釣魚臺主權問題依舊沒有解決，但漁民及其權益卻長期被連帶被犧牲。事實上島嶼主權爭議之問題許多國家均有，但有些爭端當事國能較務實的先把漁權問題處置妥當，讓漁民的經濟與工作安全得到保障，參考許紹軒（2005）。

[37] 人類安全所要引起全球關注的目的，並不是要消減主權國家地位的重要性，而是喚醒人們一切政治行爲的主要目標是在於維護人類的生活（Bedeski, 2007: prefa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新安全概念的形成

目前全球化浪潮已隨著國際經貿活動的蓬勃發展而沛然莫之能禦，世界有逐漸縮小化（shrinking world）的趨勢（Rosenau, 2003: 6；11）。傳統國際政治的基本單元（unit）－國家，開始面臨研究者的質疑與重新檢視，另一方面以「全球」或「全人類」爲主體思考的新安全概念逐漸形成。[38] 新安全概念除了將安全的主體（即指涉對象）儘可能歸附於個人之外，也形成一股回應全球化時代的安全研究思潮，像是對世界社群（world community）的重視、全人類（humankind）基本物質的供給，以及人性尊嚴的實現（Klare & Thomas, 1994；Müller, 2002: 369-391）。毋寧，安全研究的主軸開始轉向，從「國家中心」朝向「以人爲本」；而安全研究的觀察的範圍或者是分析問題的層次，亦有逐漸朝區域或全球擴延的傾向，而在適用對象上則開始針對「每一個個人」（people or individuals）的基本安全需求進行分析。

一般在探討安全概念時，多半由安全的指涉對象（referent object）、[39] 威脅類型（types of threats）、核心價值（core value）三方面來討論（蔡育岱、譚偉恩，2008b：90-91）。首先在指涉對象部分，從早期強調所謂安全就是國家的安全、軍事的安全，到國家內部政治安全、族群安全等；繼而指涉對象超越國家，涉及區域與全球安全（Terriff et al., 1999: 18-20）；晚近則開始轉向個人層次，認爲安全就是解放（emancipation），個人唯有獲得解放才能擁有真正的安全（Booth, 1991: 319）。其次在威脅類型上，由於冷戰後安全威脅類型的增加，使得原本以軍事安全（狹義的國家安全）爲重的現象有所改變，資源、環境、生態、人口等新興安全議題（Mathews, 1989: 162-177；Haftendorn, 1991: 15-16）逐漸被研究者所重視。最後是關於核心價值部分，傳統上認爲安全的核心價值在於國家，以悍衛國家領

[38] 有學者認爲此係一種「星球意識」（a sense of planetary consciousness）的逐漸形成，它促生了超越領土界限的政治認同感，從而促使多元化的國際政治組織和跨國合作行動機制的出現，詳見 Stairs & Taylor (1992: 132-136)。

[39] 所謂安全的指涉對象，指的就是「誰的安全？」（Whose Security?），像是國家、社會、族群、個人等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土、主權完整爲首要任務，但當代的安全價值已在觀念上調整爲著重國家與周遭區域的休戚與共關係，終極關切是以人類福祉爲核心之共同利益，像是海洋與水資源、健康與衛生條件、貿易與發展間的調和，以及全球糧食的供應等。[40]

目前國際社會中已有一些運用人類安全來倡議和平與形塑安全概念的實踐（Cockell, 2000: 21），尤其是加拿大、日本、挪威等國的政府，對人類安全概念的推動和重視，並在實際上達到若干成就。譬如以加拿大爲首的各國政府於一九九六年開始協商一項在全球倡議禁止人身地雷的談判工作，最後促成一九九七年《渥太華禁止人身地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之簽署。十年後，加國政府仍持續致力於國際反地雷活動，二〇〇七年十二月表示要在往後四年內撥款 8,000 萬美金，協助阿富汗清除地雷；[41] 又如一九九九年，在日本政府提議與經費浥注下，聯合國人類安全信託基金（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在美國紐約設立，用以贊助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進行人類安全相關的計畫與任務。[42] 最後是挪威方面，外交部長 Petersen (2005) 在溫哥華舉辦的「第一屆加拿大與挪威和平獎座談會」（First Annual Canada-Norway Peace Prize Symposium）上致辭表示，「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國內事務與外交事務幾乎難以區分。威脅變得沒有國界，而安全則無法分割。……國際社會唯有透過共同行動才有可能有效面對諸如恐怖主義的威脅。……無論國家的大小，身處美洲或歐洲，最後我們都要仰賴多

[40] 例如 2007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將持續推動反恐、衛生、全面供應鏈安全、以及緊急應變等人類安全議題之合作列爲重點項目，詳見 APEC 官方網址：http://www.apec.org/apec/enewsletter/aug_vol14/onlinenewsa.html。

[41] 加拿大國際發展署（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的官員表示，該國政府將捐助 8,000 萬元給聯合國地雷行動中心（UN Mine Action Centre），作爲阿富汗清除地雷與相關培訓和援助計劃之用，請參考 CTV.ca 網址：http://www.ctv.ca/servlet/ArticleNews/story/CTVNews/20071203/landmine_treaty_071203/20071203?hub=CTVNewsAt11。

[42] 此基金在日本政府的積極推動下，後來擴展至東協（ASEAN）、東協區域論壇（ARF）、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與亞太經合會（APEC）（宋燕輝，2001：27-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邊的解決模式。…這些現象正是挪威政府何以要在全世界扮演人類安全促進者角色的主要原因」。

二、新安全概念的強化

當某一「概念」（concept）在人類社會中形成或存在時，通常皆有其目的，例如爲了使社會生活有所改變，或是爲了修正不完美的既存狀態。也就是說，一個新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人們對於更美好生活的期待，像是近幾年各種環保概念因爲全球暖化的關係，而在許多重大的國際場合中被不斷提及。不過，概念往往是比較抽象的，對於能動者行爲的拘束力非常薄弱，因此如果客觀條件允許，概念形塑之後的下一步應是將其強化，轉換成某種「規範」。

按《當代朗文辭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定義，規範一般是指涉一項被普遍接受的社會行爲標準（1999：963），而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則認爲規範是「由權利和義務來界定的行爲準則。」（Krasner, 1983）；「存在於既定社會環境下，行爲者用來確定自我行爲的依據」（Axelrod, 1986）。本文對於規範採取較廣義的理解，即規範包含了習慣國際法、各種國際條約、公約或協定，甚至在某程度上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或國際制度具有近似的意義。[43] 準此，規範指的就是涉及行爲者權利與義務的標準，是身處社會中的行爲者彼此共同的理解，也是概念強化後具有拘束力的展現。若存在於國家之間，則可能以國際建制或制度的形式體現。[44]

惟任何規範的存在，並不是爲了規範而規範，而是爲了使社會生活成爲可能而規範。也就是說，透過規範可以使行爲者對於生活有期待的可能性（例如可以預期不受武力攻擊、可以預期對方不增加關稅障礙），並因

[43] 請參考 Hasenclever (1997)，又學者 Mearsheimer 則認爲國際規範與國建制和制度是相近的，因爲它們都是國家彼此協商而達成的法律規則（rule）（2001：406），另外相似的觀點，不同的涵蓋範圍亦可參考 Arend (1999: 14-28)。

[44] 在 Finnemore 與 Sikkink 的研究中指出，國家或非國家行爲者（非政府組織、知識社群等）往往先將某一概念（或知識）作爲進行說服其它行爲者的工具，讓其經由時間得到充分的形塑，再藉由社會化或制度化的歷程，以雙邊或多邊的外交形式，將其轉換爲規範，盡可能讓所有行爲者都能接受（1998：887-9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而規劃與進行互動往來。以此觀之，「安全規範」的主要功能應該是滿足人類對於安全利益的追求，所謂「利益」指的是能夠使人覺得放心與愉快的狀態（例如居住的地方沒有天災發生、所需要的物資不至匱乏）。然而，這種期待的可能性與對利益的滿足，在技術上如何達到，以及如何分配不同能動者或行爲者之間爲了追求安全生活而應該付出的成本，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傳統安全研究的方法是，習慣性的把國家視爲核心指涉對象；對內，它必須要能保衛其國民的生命與財產，對外，則必須有足夠的能力防止其它國家或外來團體對其領土、政權、或國民所可能造成的侵擾。因此，安全規範在形塑的過程中特別著重使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外部威脅與不確定性（換個角度看，就是增加可預期性）。此種安全規範或是安全文化一方面強調國家自身的安全，一方面凸顯出安全在獲得過程中的衝突與競爭本質。毋寧，在傳統安全研究的視野下，國家間存有不可避免的衝突關係，安全是可以區分你／我的、是可以被切割的概念，唯有權力的擁有者才可能在與其它國家的互動過程中得到安全（Waltz, 1981: 49-73；Miller, 1985；Taliaferro, 2000: 131）。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傳統的安全規範在技術上是以軍事作爲滿足期待與利益的方式，同時以軍事上的權力多寡來解決如何分配安全成本的問題。此種安全規範在上個世紀得到強而有力的形塑，並且幾乎支配了安全研究的發展，但問題是這樣的安全規範或分配方式合理嗎？是否到了二十一世紀還應該繼續被實踐與延續？

有別於傳統的安全研究，以「人」爲主體的安全概念透過建構主義的詮釋，在基本態度上對傳統安全規範提出質疑和進行反思，認爲安全利益的追求應該可以有一番不同的面貌。說得明白些，軍事手段是追求安全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它的本意是用來保護人的，而不是奴役或傷害人的。雖然傳統安全規範某程度上經由新自由主義的修正，在技術上轉向以「合作」代替「軍事」，但作爲體現合作方式的國際制度或國際組織還是沒有離開國家中心論或是權力本位的思考，因此安全規範中的強者效應還是時有所見，既得利益者總是能夠在合作過程中迴避有關安全成本如何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配的問題。[45] 因此本文認爲，人類安全概念的形塑與強化應是當代國際關係努力的方向，並以此種新安全概念作爲追求安全利益與分配安全成本的新思考。進一步說，追求安全是任何能動者的本性，只是在追求安全利益的同時，國際關係是不是在視野所未及的地方，付出更爲慘痛或難以承受的代價？若以近兩年開始受到全球關注的糧食危機（food crisis）爲例，自二〇〇七年開始糧價上漲的速度達到近三十年的新高，讓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陷入飢饉的危機中，糧食暴動事件也因而逐漸增加。根據相關資料顯示，此次糧食危機的原因主要有：⑴氣候變遷導致糧食減產；⑵食用性農作轉爲能源性作物；⑶全球可使用的農地面積已接近極限（Chossudovsky, 2008）。此三項原因無一不與「自私的」利益追求和「不公平」的成本分配有關，其結果是少數人的短期安全利益得到滿足，但全球卻恐怕要開始爲之付出長期的高額安全成本。[46] 換句話說，今天的糧食危機和其所導致的不安全是國際社會咎由自取的惡果，只不過真正該承擔惡果的能動者把責任轉嫁到沒有能力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動者身上。

面對這樣的問題，國際社會應開始反省傳統安全觀中的疏失與缺漏，而不是繼續把自己的安全利益建立在別人的痛苦和不安全之上。若是如此，則國際關係中的安全文化恐怕就要淪爲冤冤相報的無止境循環，一旦

---

[45] 這裡提供兩則事例：一是聯合國的集體安全機制，一是世界銀行有關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前者雖然是新自由主義理念的落實，但身爲集體安全機制的核心機構，也就是安理會，卻在實際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歷程中不時表現出新現實主義的安全思維。後者作爲新自由主義在二戰後建立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實際上在其組織條款中更爲強調生產能力、資本累積，而不是對於國家貧困與發展的具體幫助（Johnstone, 2003: 437-480；Blokker, 2000: 541-568；Finnemore, 1996: 92-95）；此外，Stiglitz 亦在衣索比亞的例子中指出更多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不當，也指出世界銀行對於援助貧困國家的冷漠（2002：23-52）。

[46] 先進國家或是大型跨國公司利用全球市場對糧價高漲提供了一定的「貢獻」。目前全球糧食價格是由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決定，受到美國次級房貸的影響，不少投資者脫離房地市產轉進糧食市場，在預期生質能源未來行情看漲的情況下，小麥、玉米等期貨價格日益攀升，於是形成「富者賺到飽，窮人餓肚子」的糧食危機。依據糧農組織早先的資料，2000 年至 2002 年間，全球有近 8 億 5 千萬人因缺糧而營養不足。其中，有 8 億 1 千萬人在發展中國家，只有 4 千萬人在工業先進國家。國際社會因追求安全而致生的不公平現象，由此可見（FAO, 2004）。

東海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冤冤相報成爲所有國際社會能動者間的共享知識時，這種制度化的冤冤相報文化，會讓大家都得不到安全。基於這樣的思考，本文認爲，人類安全概念的形塑與強化確有其必要性。人類安全強調「以人爲本」的思考，以無歧視的態度去重視每一個「個人」追求與獲得安全的權利，因爲只有當「個人」的安全獲得重視與落實後，許多安全困境的難題才可能獲得根本性的解決。試想，如果每個「個人」的安全利益都得到尊重與衡平的對待，[47] 誰還會有意願冒著喪命的風險去當恐怖份子或被視爲暴民與叛軍去和政府的軍警人員對抗呢？

陸、結　語

儘管國關理論界對於建構主義是否屬於「理論」尚存有不同見解（Kowert et al., 1998: 58），但以它作爲探索國際社會某一現象的研究工具或分析途徑則沒有太大爭議（Adler, 2002: 95-118）。建構主義在詮釋能動者如何形成認同，[48] 以及如何經由認同來確立所需之物質或非物質利益時，確實比傳統主流國關理論有更深入與細膩的觀察。人類安全是項概念在安全研究的領域中猶如一種新的集體認同、利益偏好、語言與規範或是安全文化，因此適合以強調觀念本體論的建構主義來進行理解與詮釋。當然，以建構主義來詮釋人類安全並不代表物質世界或物質因素不再重要，更無意否定國家安全或是軍事議題的價值；相反地，人類安全在建構主義的詮釋下是爲了幫助我們觀察能動者在追求安全利益的過程中是如何進行互動的，以及如何被結構所影響進而對之做出反饋。

建構主義下的人類安全可以說是安全研究領域中的修正主義者，一方面對傳統政治、經濟、主權國家、軍事安全等觀點提出質疑，一方面將新的安全思維引入既有的安全研究，特別是幫助原本在以國家爲中心的安全思考下被壓抑之弱勢群體得到解放，讓安全利益的追求與安全成本的分配

[47] 尊重與衡平對待遠較需求的「滿足」更爲重要。因爲人類慾望是無窮的，滿足的作法不具有可能性，因此並非解決衝突或落實安全的治本之道。誠摯的尊重個人需求，在落實過程中盡可能的給予公正平等之對待，才根本之法。

[48] 這些政治行爲者包括了個人（你我）、國家、政黨、國際組織等（Kolodziej, 2005: 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兩者間能達到一個平衡與和諧的狀態。本文在探索人類安全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一項安全認知的轉變或新安全概念的形塑，實與特定的國際環境時空背景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在傾向霍布斯式（Hobbesian）的無政府文化內涵中，國家力求自身安全者眾，努力建構集體式安全者寡。當面對無法避免的安全利益衝突時，犧牲別人來成全自己是幾乎所有能動者必然的行爲選擇。此觀之國家中心論與權力兩項命題長期居於安全研究的主導性地位，並使得軍事安全在國際關係中獲得較高的關注程度，即可明瞭。然而，無政府狀態本身是一個「空的」的現象，其具體內涵爲何，也就是所謂無政府狀態的文化究竟爲何，是取決於特定時間與空間環境中能動者彼此間的關係與互動情況而定（Wendt, 1992: 391-425）。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浪潮讓傳統國際政治的基本單元—國家，開始面臨研究者的質疑與重新檢視，另一方面以全人類爲主體思考的新安全概念開始逐漸形成。此種概念除了將安全的指涉對象儘可能歸附於個人之外，也同時在全球化的脈絡之下形成類似建構主義安全社群的觀點。這一方面的例子在人權與環境領域尤其明顯，換句話說，安全研究的內涵有漸漸脫離國家中心的傾向。此種安全概念的轉變可以說是人類對於外部環境變化的一種反應，但是否能在未來的社會互動實踐中得到更多的認同與強化，有其不確定性。[49] 畢竟建構主義只能裨益人類安全概念的形塑，但無法保證人類安全概念得到進一步強化或是獲得國際社會中能動者的普遍認同。

人類安全概念能否在形塑後得到強化取決於能動者互動過程中對於安全利益的認知，如果多數能動者還是執著於可分割式的安全觀，或是避諱安全成本分配問題的討論，那麼單靠目前聯合國和若干中型國家倡議與推動的人類安全概念恐怕前景堪慮。不過，對於人類安全這種概念，在全球化的時代要對之完全否定，恐怕也是不切實際。事實上，如果要問人類安全概念的形塑有沒有意義，那麼作者認爲答案是，「有」。今天除非主權國家有意走回頭路，放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共識，讓彼此的關係呈現

[49] 對此，本文的匿名審查委員提出一項寶貴的建議，即以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的角度著手，透過不同分析層次中行爲者支持與實踐人類安全的程度來進行更爲深入的研究。目前相關的代表性研究有：Haas (1992: 1-35)；Youde (2005)；Sugden (2006: 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霍布斯式的文化，那麼人類安全概念的倡導才會顯得不可行與毫無希望。竟然，目前國際社會中的多數主權國家並沒有這樣的打算（Wendt, 2003: 491-542），我們便似乎沒有理由放棄對傳統安全研究中的疏漏提出質疑和進行反思。因此本文認爲，國際關係的研究者應該努力在長時間所習慣的傳統安全思維裡，試著注入些許有助於能動者間平等對待與合理互動的人類安全概念，並讓它在二十一世紀得到強化，也讓我們每個人的安全獲得強化。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石之瑜，2001，〈做爲藝術的政治學—兼評建構主義的科學哲學立場〉，《美歐季刊》，15(2): 265-300。

李曉華譯，2002，《文化規範與國家安全：戰後日本警察與自衛隊》，北京：新華出版社。譯自 Peter J. 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宋燕輝，2001，〈人類安全之發展與推動：亞太國家的態度及作法〉，「人類安全與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研討會」論文（9 月 14 日），臺北：臺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

肖鋒譯，2006，《建構世界中的國際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譯自 Kubalkova, V., N. Onuf, and P. Kowert（編），*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Press. 1998.

宋學文，2001，〈The Implication of Cross-Level of Analysi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Theory〉，徐永明、黃紀（編），《政治分析的層次》，臺北：韋伯文化，頁 81-116。

林碧炤，2001，〈全球化與人類安全〉，「人類安全與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研討會」論文（9 月 14 日），臺北：臺灣綜合研究院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略與國際研究所。

袁　易，2004，《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一個社會建構論的觀點》，臺北：五南出版社。

倪世雄，2005，《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姜家雄、蔡育岱，2007，〈國際關係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國際關係學報》，24: 115-144。

張家銘等譯，1997，《社會學》，臺北：唐山出版社。譯自 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London, UK: Macmillan. 1982.

莫大華，1999，〈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國際關係理論的另一次大辨論〉，《政治科學論叢》，19: 145-179。

莫大華，2007，〈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政治科學論叢》，31: 175-215。

陳欣之，2004，〈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一個國際安全合作制度的孕育、持續與改變〉，《政治學報》，37: 111-158。

許紹軒，2005，〈軍艦護漁 衝突升高 徒增緊張〉，《自由時報》網路版：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n/27/today-p3.htm。

鄭端耀，2001，〈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評析〉，《美歐季刊》，15(2): 119-229.

蔡育岱、譚偉恩，2008a，〈從「國家」到「個人」：人類安全概念之分析〉，《問題與研究》，47(1): 151-188。

蔡育岱、譚偉恩，2008b，〈雙胞胎或連體嬰：論證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關係〉，《國際關係學報》，25: 77-118。

蔡育岱，2008，〈人類安全概念在臺灣外勞問題上之適用性〉，「國際關係學會首屆年會暨臺灣與國際關係的新紀元學術研討會」論文（5 月 10 日），臺北：國際關係學會。

譚偉恩，2008，〈國際貿易中的食品安全：『中國製造』的威脅或全球化的宿命？〉，「國際關係學會首屆年會暨臺灣與國際關係的新紀元學術研討會」（5 月 10 日），臺北：國際關係學會。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英文部分

Acharya, A. 2002. “Debating Human Security: East Versus the West.” http://www.hsph.harvard.edu/hpcr/events/hsworkshop/acharya.pdf

Acuff, J. 2007.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Pluralism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Argum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211986_ index.html

Adamson, F. & M. Demetriou. 2007. “Remapping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corporating Diasporas into IR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4): 489-526.

Adler, E. 2002.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E. Simmons London: Sage, 95-118.

Adler, E. and M. N. Barnett eds. 1996. “Governing Anarchy: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 63-98.

Annan, K. 1999. *Towards a Culture of Prevention: Statements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Commission on Preventing Deadly Conflict.

Arend, A. 1999. *Legal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xelrod, R. 1986. “An Evolution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1095-1111.

Bailes, A. K. 2006. “Peace Research Today: What, Why and Who?” *TAPRI 35th Anniversary Seminar, Tampere*. Website of SIPRI, http://www.sipri.org/contents /director/20060503001.html.

Bajpai, K. 2000. “Human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Kroc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9: 1-3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arker, R. 1990.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deski, E. 2007. *Human Securi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eetham, D. 1991.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Blokker, N. 2000. "Is the Authorization Authorized? Powers and Practic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Authorize the Use of Force by 'Coalitions of the Ableand Will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3): 541-568.

Booth, K. 1991.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4): 313-326.

Bronowski, J. and B. Mazlish eds. 1960.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Bruderlein, C. 2000.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in Building Human Security: The Case of Armed Groups in Intra-State Wars." http://www.humansecuritynetwork.org/docs/report_may2000_2-e.php.

Bruner, J. 1986.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ark, I. 2003. "Legitimacy in a Glob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9: 75-95.

Chossudovsky, M. 2008. "The Global Crisis: Food, Water and Fuel: Three Fundamental Necessities of Life in Jeopardy." *Global Research*,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9191.

Cockell, J. 2000. "Conceptualizing Peacebuilding: Human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Peace." In *Regeneration of War-Torn Societies,* Michael Pugh, ed. London: Macmillan, 15-34.

CTV.ca, "Canada announces new Afghan anti-mine funding." http://www.ctv.ca/servlet/ArticleNews/story/CTVNews/20071203/landmine_treaty_071203/20071203?hub=CTVNewsAt11

Deudney, D. 1990. "The Case Against Link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d National Securit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3): 461-476.

Deutsch, K. 1955.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Dougherty, J. and R. L. Pfaltzgraff, Jr. eds. 2001.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Longman.

Doyle, M. 1983. "Kant, Liberal Legacy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3): 323-353.

Durkheim, E.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Ene, C. 1997. "Romania Sets its Sights on NATO Membership." *NATO Review* 45(6): 8-11.

FAO, 2004.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FAO, http://www.fao.org/documents/show_cdr.asp?url_file=/docrep/007/y5650e/y5650e00.htm.

Finnemore, M. 1996.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innemore, M. and K. Sikkink. 1998.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887-917.

Galtung, J. 1969.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3): 167-191.

Galtung, J. 1985. "Twenty-five Years of Peace Research: Ten Challenges and Some Respons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2: 141-158.

Ginkel, H. and E. Newman. 2000. "In Quest of 'Human Security'." *Japanes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4(1): 59-82.

Haftendorn, H. 1991.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 35(1): 3-18.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3859): 1243-12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senclever, A. and V. Rittberger. 1997.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ss, P. 1992.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1): 1-35.

Hassing, F. 1997. *Final Causality in Nature and Human Affairs*. Washingt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Held, D. et al., eds.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Oxford: Polity Press.

Hobbes, T. 1651. *Leviathan.* London, 1651. Website of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http://oregonstate.edu/instruct/phl302/texts/hobbes/leviathan-c.html# CHAPTERXV.

Hopf, T. 1998.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1): 171-200.

Ikenberry, G. J. 2001. *After Vic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 R. and G. Sorensen. 2007.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e, I. 2003. “Security Council Deliberations: The Power of the Better Argu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4(3): 437-480.

Katzenstein, P. J. ed. 1996.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 J. ed. 2005. *A World of Region: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im, Samuel. 1999. “East Asia and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Asian Perspectiv*e 23(4): 5-44.

King, G. and C. Murray. 2002.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6(4): 585-610.

Klare, M. T. & D. C. Thomas. 1994. *World Security-Challenges for a New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olodziej, E. A. 2005.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Kowert, P. et al. eds.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Krasner, S. D. e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atochwil, F. 1989.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pchan, C. and C. Kupchan. 1995. "The Promis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52-61.

Kupchan, C. and C. Kupchan. 1991. "Concerts,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6(1): 114-161.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3rd ed. 1999. New York : Longman.

Macmillan, J. 2004. "Whose Democracy? Which Peace? Contextualiz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1: 472- 493.

Mathews, J. T. 1989.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68(2): 162-177.

Mathews, J. T. 1997.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76(1): 50-66.

Meadows, D. H. et al. eds.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Mearsheimer, J. 1994.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5-49.

Mearsheimer,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Meron, T. 2000. "The Martens Clause, Principles of Humanity, and Dictates of Public Con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4(1): 78-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ercer, J. 1995.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2): 229-252.

Miller, S. E. 1985.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üller, H. 2002.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369-391.

Newman, E. 2001.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3): 239-251.

Nhema, A. 2006. “The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s Contributions to Human Security Research in Africa.” In *A Decade of Human Security: Global Governance and New Multilateralisms*, eds. Sandra J. Maclean, David R. Black, and Timothy M. Shaw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 193-200.

Oberleitner, G. 2005. “Human Security: A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Law?” *Global Governance* 11(2): 185-203.

OECD, 2003. *A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Lens on Terrorism Prevention: Key Entry Points of Action*. OECD, http://www.oecd. org/ dataoecd/17/4/16085708.pdf.

Onuf, N. G. 1989.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Pairs, R. 2001.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2): 87-102.

Perry, D. 2006. “Why Hearts and Minds Matter: Chivalry and Humanity, Even in Counterinsurgency, Are not Obsolete.” *Armed Forces Journal*, http://www.armed forcesjournal.com/2006/09/2002037/.

Petersen, J. 2005.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First Annual Canada - Norway Peace Prize Symposium.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f British Columbia, http://www.regjeringen.no/nb/dokumentarkiv/Regjeringen-Bondevik-II/Utenriksdepartementet/265100/269185/perspectives_on_international_peace.html?id=269746.

Pramono, S. 1998. “The Genocidal Global Politics and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4(2): 115-138.

Ratner, S. and J. Abrams. 1998. *Accountability for Human Rights Atroci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Beyond the Nuremberg Leg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Reinalda, B. and M. Noortmann eds. 2001. *Non-St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dershot: Ashgate.

Rosenau, J. 2003. *Distant Proximities: Dynamics beyond Globaliz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thschild, E. 1995. “What is Security?” *Daedalus* 124(3): 53-98.

Ruggie, J. G. 1983.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World Polity.” *World Politics* 35(2): 261-285.

Ruggie, J. G. 1998.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855-885.

Russett, B. 1993.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lamon, L. M. 1994.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73(4): 109-122.

Sally, R. 1998.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Studies in Theo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Searle, J.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act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imon, W. 1995. “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Pacific Review* 8(1): 5-24.

Smith, S. 2000. “The Increasing Insecurity of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Critic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flections on Security and Change, eds. Stuart Croft and Terry Terriff. London: Frank Cass, 72-101.

Stairs, K. & P. Taylor. 1992.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Oceans: A Case Study.”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eds. Andrew Hurrell and Benedict Kingsb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11-141.

Stapel, J. 2008. “A Realist-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xplaining the Genesis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Lisbon Agend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SA's 49th,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254484_index.html.

Stiglitz, J.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Stockholm: Prime Minister’s Office. 1991. “Stockholm Initiative on Glob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1990’s.*

Sugden, J. 2006. “Security Sector Reform: The Role of Epistemic Communities in the UK.” *Journal of Security Sector Management* 4(4): 1-20.

Tadjbakhsh, S. 2007. *Human Security: 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Taliaferro, J. 2000.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 128-161.

Terriff, T. et al. 1999. *Secur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UNDP. 199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Website of UNDP,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4/en/

UNDP. 200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 Website of UNDP,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00/

UNDP. 2008.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Website of UNDP,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07-2008/

Walsh, J. 2001. “National Preferenc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Quarterly 45(1): 59-80.

Walt, S.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110: 29-46.

Waltz, K.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Waltz, K. 1981. “A Strategy for the Rapid Deployment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5(4): 49-73.

Wendt, A.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 391-425.

Wendt, A.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71-81.

Wendt, A. 1996. “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eds.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Boulder: Lynne Rienner, 47-64.

Wendt, A.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dt, A. 2003.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4): 491-542.

Youde, J. 2005. “Counter-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70440_index.htm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haping the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
a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Yu-Tai Tsai** & *Wei-En Tan***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attitude toward security study should be one of constant questioning, as well as consideration of all possible perspectives. Only through such studies can we fully comprehend and resolve security related issues. As for how we go about this, in the author's opinion, all normal human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in pursuit of the same goal—to seek the benefits of security. When a new security concept takes form, it actually reflects the insufficiency of current security concepts and related theories. Thus, the purpose of shaping a new concept of security is to help humankind more effectively, economically and equably pursue security interests in a way that suits the present time mo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exist as an objective fact, but are not entirely presented in tangible form. That is because both "tangible" and "objective" ways of interpreting such relationships may contain "intangible" and "subjective" demands from certain ideologies.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that ontologically adapt materialism and objectivism are often used by a handful of agents. That handful of agents can easily use those tools to solidify their power and interests. Such theories ignore the fact that security cultures can be modified. Moreover, they often underestimate issues of justice and fairness when trying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terpret and explain human security, a new concept that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security, in the hope of bringing about equable and reasonable interaction amidst long established think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n tradi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Constructivism, Human Security, Tradi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of Security,Shared Knowled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